

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

蔡洁 陈军亚*

摘要: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对中美贸易关系形成严峻挑战。然而,中美贸易不仅仅影响两国间的经济关系,还会对两国的政治关系造成影响。本文用理论模型证明了贸易发展有减少或抑制冲突发生的作用,同时用 1995-2010 年中美两国的数据证明中美贸易发展是中美政治合作的显著动因,虽然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政治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但两国的贸易和政治合作仍存在长期平稳且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金融危机下中美应加强经贸合作以稳定双边关系,而非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行对峙。

关键词: 中美贸易 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

一、引言

始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弥漫全球,导致各国经济的衰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和纷争,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2009 年全年美国对华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 29 起,涉及我国 76 亿美元产品的出口,案件数量增加 53%,金额增长了 8 倍。2009 年 9 月,奥巴马批准未来 3 年对中国输美轮胎在 4% 的常规关税基础上分别加征 35%、25% 和 20% 的惩罚性关税。2009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决定对华油井管加征 10% ~ 16% 关税,涉及金额 27 亿美元,是迄今美国对华贸易制裁涉及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2010 年美国贸易保护措施仍持续增加,1 月 21 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钻管发起“双反”调查,2 月 5 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钢丝层板初步征收 43% ~ 289% 的反倾销关税,3 月 2 日又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和磷酸盐等产品征收初步反补贴税。但是,贸易保护政策势必会对中美两国造成经济损失,因为不论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产业链来看,两国经济都有较强的互补性,贸易双方互补性越强,贸易所得也越多,发起贸易保护对双方的损害越大。

贸易保护除了损害两国的经济利益,还可能会对两国政治关系造成影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各国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实行贸易保护会对两国政治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关于经贸发展通常条件下会对两国政治与外交产生何种影响,至今仍没有主导性的意见。一派观点认为,如果国家间有一种密切的经济关系,那么政治与外交对抗的成本与代价随之增大。但另一派观点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间不一定有相互联系。比如,中美关系尽管在冷战结束后起伏不断,时有危机,但双方经贸关系却一直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那么中美经贸发展与两国政治关系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如果有,前者会对后者造成何种影响,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如何营造良好的多边环境成

* 蔡洁,华中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9,电子信箱:ripplecj@sina.com;陈军亚,华中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9。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冲突的防范:基于经贸角度的分析”(项目号:09YJC7901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研究”(项目号:09YJC790110)、湖北省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项目“贸易和直接投资对金融危机下国际冲突的作用及中国对策”(批准号:[2009]033)、湖北省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项目“湖北省 FDI 流入与‘两型社会’建设的环境污染控制问题研究”(批准号:[2009]032)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为各国面对的主要问题。研究中美贸易对两国政治关系的效应,从而有效利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冲突,稳定两国关系,实现经济平稳有效地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改进了理论模型。我们以 Polachek (1992) 和 Reuveny (2003) 的研究为基础,将模型中假定两个国家间只有一种关系状态拓展为两种状态,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假定更为吻合。第二,本文较直观地分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冲突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影响的过程。第三,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了新的数据。我们根据哈佛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开发冲突与合作数据的方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中美关系的事件记录用 Goldstein (1992) 的标准^①进行打分,较以往学者采用的纯冲突数据而言,该数据更全面具体,而较之于哈佛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只开发到 2004 年的数据,我们更新到了 2010 年。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综述了研究国际贸易对国际和平的影响以及中美贸易影响政治关系的文献的主要观点。第三部分用理论模型剖析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和平的影响。第四部分阐述了中美政治关系发展近十几年来的状况,并用实证方法分析中美经贸关系对营造两国政治关系的作用。第五部分是结论与进一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贸易消减冲突促进和平;(2)贸易既可能导致冲突,也可能消减冲突,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和条件;(3)贸易增加冲突;(4)贸易与冲突没有关系。由于一些基础概念、理论和数据使用的差异,使得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影响的结论不统一。

支持贸易对国际和平有促进作用的学者认为,贸易可以消减国际冲突,因为:第一,贸易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提高了贸易参与国的整体财富水平,而冲突会中断贸易从而导致经济损失,因此冲突的机会成本提高,国家不会轻易选择冲突战略 (Polachek 1980 1999 Dorussen 2006 Valentin 2006 庄宗明和蔡洁, 2008a b);第二,贸易可促进国家间信息的交流,从而避免了国家间由于信息不充分而爆发战争。对称的信息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当两国有利益冲突的苗头时,可用贸易来传递信息而不用通过政治谈判甚至诉诸武力 (Cai and An 2010 Lee 2005);第三,贸易会削弱国家间的敌意 (Süheyla and Nur 2001)。经济领域的合作机制可以扩展和外溢到其他领域,使合作领域扩大,合作层次提高。在不断加强和深化的合作中,有可能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确立共同的利益预期和规范,从而改变贸易伙伴国的态度和观念,使它们发展成为“安全共同体”,从而实现国家间的和平 (Snitwongse 1998)。第四,贸易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国家的内部经济乃至政治制度和政治联盟,从而影响国家决策。当贸易部门的力量占上风时,他们会促使国家采用和平而非冲突战略 (Schneider and Günther 2003)。

认为贸易对冲突的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形和条件的学者以 Hirschman 为主要代表人物。Hirschman (198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互惠贸易对依赖和主导权的影响”,他通过强调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负面作用证明了贸易的影响力,并发现不对称贸易关系在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具有很强的负面影响。Waltz (1979) 叙述了国家不愿在经济交换中获得不平等的利益。根据 Waltz 的观点,更高的相互依赖和更近的接触提高了冲突的可能性。Barbieri (1996) 也认为,对称的相互依赖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导致更多的冲突。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注重强调经济相互依赖是否对称对国际冲突的影响。

持贸易增长会引发冲突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贸易可间接地引发冲突。各国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会转换成军事实力,贸易增长产生的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及权力转移会引起冲突,对本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Mearsheimer 1990)。另一方面,贸易本身也可能产生冲突。随着贸易的增加,国家之间的接触面也因此扩大,诸多经济争端会随之出现 (Waltz 1979)。

还有学者认为贸易和平论和贸易冲突论都忽略了贸易可能同时产生合作与冲突的可能性,主张贸易和冲突之间没有系统的逻辑联系 (Ripsman and Blanchard 1996)。

上述不同观点反映了国际关系复杂现实的一个方面,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适用的情况不同而已,所以需要针对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猛,中国在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作用增强,美国学术界开始了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研究 (Donovan

^①由于篇幅限制,不在此列出该评分标准,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1995 M astandung 1992), 但其中分析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影响的内容非常少。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 以剖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化、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政治化为主 (柳剑平和刘威, 2009)。研究中美贸易关系对政治关系影响的文献中, 主流观点认为, 在中国和美国这种既存在合作又有冲突因素的双边关系中, 贸易会带来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抑制冲突升级, 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郎平, 2006)。

三、理论模型

本文理论模型的建立以 Polachek 和 Reuveny 的研究为基础 (Polachek 1992 Reuveny 2003)。Polachek 和 Reuveny 的模型中假定两个国家间就只有一种关系状态, 本文将国家间关系分为两种状态, 一种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行为, 另一种是中国向美国发起的行为。因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应该描述为行为个体之间的互动, 即“谁对谁做了什么”, 本文的假定与国际关系理论更为吻合。同时, 本文具体分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冲突间相互影响的过程。

用 J 国代表美国, K 国代表中国, 模型假定中美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合作没有关系, 单独分析两个国家和一种商品。 CC_{JK} 表示由 J 国向 K 国发起的冲突和合作的行为, CC_{KJ} 表示由 K 国向 J 国发起的冲突与合作行为。一般说来, CC_{JK} 不等于 CC_{KJ} 。假定 J 国为发达国家, K 国为发展中国家, J 国基于 K 国对它的策略 (CC_{KJ}) 来选择行为 CC_{JK} 。

在 J 国, 冲突被定义为 $Z_J = -CC_{JK}$, 在 K 国, 冲突被定义为 $Z_K = -CC_{KJ}$ 。冲突是正数, 合作是负数。考虑 J 国即发起国政府对贸易伙伴国 K 国即目标国发起的冲突。 J 国的社会福利函数由 $U(C_J, Z_J)$ 表示, C_J 是 J 国的消费, 消费可被视作外生变量。将福利函数分别对消费和冲突求导, 得到: $\frac{\partial U}{\partial C_J} = U'_{C_J}, \frac{\partial U_{C_J}}{\partial C_J} = U''_{C_J C_J}, \frac{\partial U}{\partial Z_J} = U'_{Z_J}, \frac{\partial U_{Z_J}}{\partial Z_J} = U''_{Z_J Z_J}$ 。假设随着国内消费的增加社会福利增加, 但消费的边际效用降低, 则 $U'_{Z_J} > 0, U''_{Z_J Z_J} < 0$ 假定当一国对另一国发起冲突时发起国获得满足, 但冲突的边际效用降低, 则 $U'_{Z_J} > 0, U''_{Z_J Z_J} < 0$ J 国的消费为 $C_J = Q_J + Q_{KJ} - Q_{JK}$, 其中 Q_J 是 J 国的国内消费, Q_{KJ} 表示从 K 国到 J 国的出口, Q_{JK} 表示从 J 国到 K 国的出口。 Z_J 提高了 J 国对 K 国出口的难度, J 国的商品出口到 K 国受到排斥, 只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 而 K 国也不愿意出口到 J 国, 除非有更高的价格吸引, 因此 Z_J 使得 J 国出口到 K 国的价格 (P_{JK}) 下降, J 国支付给 K 国的价格 (P_{KJ}) 提高, 于是 $(P_{JK})'_{Z_J} < 0, (P_{KJ})'_{Z_J} > 0, (P_{JK})''_{Z_J Z_J} < 0, (P_{KJ})''_{Z_J Z_J} > 0$ 假定冲突会直接影响进口和出口, 会减少贸易并导致“贸易利得”的损失, 因此冲突的成本在于减少进口和出口的量, 这说明 $(Q_{JK})'_{Z_J} < 0, (Q_{JK})''_{Z_J Z_J} < 0, (Q_{KJ})'_{Z_K} < 0, (Q_{KJ})''_{Z_K Z_K} < 0$ 而冲突也会带来好处, 比如攫取资源或取得压倒性的地位等, 算作是冲突的收益。

对于给定的 Q_J, Q_{JK}, Q_{KJ} , J 国政府通过选择 Z_J 来最大化本国的效用, 约束条件是预算平衡 $Q_{JK}P_{JK} - Q_{KJ}P_{KJ} = 0$ 则拉格朗日函数为:

$$L = U(Q_J + Q_{KJ} - Q_{JK}, Z_J) + \lambda(Q_{JK}P_{JK} - Q_{KJ}P_{KJ}) \tag{1}$$

将拉格朗日函数对 Z_J 求导, 再将结果对 P_{JK} 求一阶导, 得到:

$$\frac{\partial Z_J}{\partial P_{JK}} = \frac{-\lambda Q'_{JK} [U_{Z_K Z_K} + \lambda(Q''_{KJ}P_{KJ} - Q''_{JK}P_{JK})]}{[U_{Z_J Z_J} + \lambda(Q''_{JK}P_{JK} - Q''_{KJ}P_{KJ})] [U_{Z_K Z_K} + \lambda(Q''_{KJ}P_{KJ} - Q''_{JK}P_{JK})] - U_{Z_J Z_K}^2} \tag{2}$$

其中 $\lambda > 0, (Q_{JK})''_{Z_J Z_J} < 0$ 而 J 国为发达国家, K 国为发展中国家, 因此 $Q''_{JK}P_{JK} - Q''_{KJ}P_{KJ} < 0, U_{Z_J Z_J} + \lambda(Q''_{JK}P_{JK} - Q''_{KJ}P_{KJ}) < 0$ 可得 $\frac{\partial Z_J}{\partial P_{JK}} < 0$ 即贸易对冲突影响的符号为负, 所以, 随着从发起国到目标国出口价格的提高, 发起国对目标国的冲突减少。

分别对 Q_{JK} 和 Q_{KJ} 求一阶导, 得到:

$$\frac{\partial Z}{\partial Q_{JK}} = \frac{-\lambda P'_{JK}}{U_{Z_J Z_J} + \lambda(Q_{JK}P''_{JK} - Q_{KJ}P''_{KJ})} \tag{3}$$

$$\frac{\partial Z}{\partial Q_{KJ}} = \frac{-\lambda P'_{KJ}}{U_{Z_K Z_K} + \lambda(Q_{JK}P''_{JK} - Q_{KJ}P''_{KJ})} \tag{4}$$

式 (3) 和式 (4) 的符号均为负, 因此, 随着 Q_{JK} 和 Q_{KJ} 提高, Z 下降, 即随着 J 国和 K 国贸易量的增加, 两国间的冲突减少。

贸易与国际冲突间的影响是一个相互的、循环的过程,可以用图 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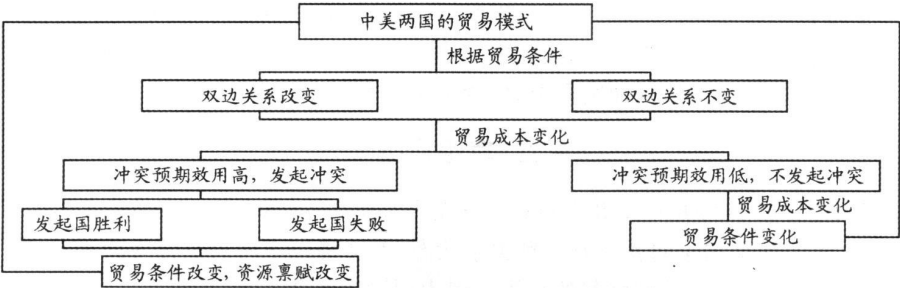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贸易和国际冲突间的作用机制

起初两国存在一种贸易模式,若贸易条件有利于双方贸易发展,两国关系稳定,若贸易条件不利于双方贸易发展时,两国关系不稳定,于是发生改变。随着双边关系变化,贸易成本随之改变,假设贸易成本变高,如果国际冲突的预期收益低,与冲突的收本相比,净收益不确定,则一国倾向于不发起冲突。如果国际冲突的预期收益高,国家从冲突行为中可以获得较大的好处,则一国倾向于发起冲突。发起冲突后有两种可能^①,发起国胜利或发起国失败,这两种结果都会导致贸易条件改变,两国的资源禀赋改变,于是进而使两国间的贸易模式发生变化。如果没有发起冲突,则资源禀赋不发生变化,但由于先前的贸易条件变化,此时贸易条件仍处于变化后的状态。

四、实证分析

(一)中美政治关系发展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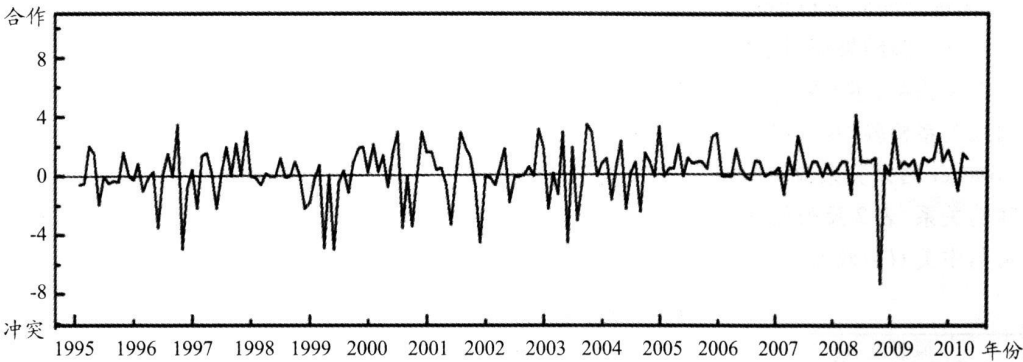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摩擦和大小不一的波动,但双方总能够在发现共同利益中化解矛盾、求同存异,获得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势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存在着四个引人注目的基本问题:人权、贸易、武器扩散和台湾问题。1995年克林顿政府准许李登辉访美和 1996年 3 月的台湾海峡危机导致中美关系下降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而基于对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美国政府考虑到,对中国这样一个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应该采取接触政策而不是孤立政策,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美国政府在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的条件下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考虑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中美关系的好转发生在“9·11”事件之后。“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之后,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变化,它开始寻求同中国建立新的和直接的战略合作关系。小布什政府认为,中美关系不再限于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人权上的分歧,而是具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上呈现出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则进一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然而,围绕经贸、人权、气候等议题,中美之间仍然矛盾不断,因权力过渡而带来的政策波动在双边关系中也时常体现出来。

回顾这三个政府执政时期的事件,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第一,美国强化霸权与中国政治影响迅速上升之间存在冲突。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对外联系的增多,中国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安全、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对话,扩大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以便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然而,中国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影响的扩大,将不可避免地美国的霸权相遇。多年来中美之间在人权、台湾地位和地区安全结构等诸多领域的交锋都是美国强化霸权与中国政治影响迅速上升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第二,美国维护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与中国拓展发展空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影响和制约。这使得它们希望为自身经济的发展争取尽可能多的空间和机会。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和发展空间有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两国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激烈摩擦。第三,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的矛盾。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地区独立倾向渐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对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对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对关系国家发展的海外利益都十分重视。而作为世界体系中霸权国的美国则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美国高度警觉其他国家对其安全地位的任何挑战,绝不容许这类挑战破坏其建立的霸权战略。中美安全

①虽然可能出现僵持状态,但僵持到最后仍旧要变为胜利或失败这两种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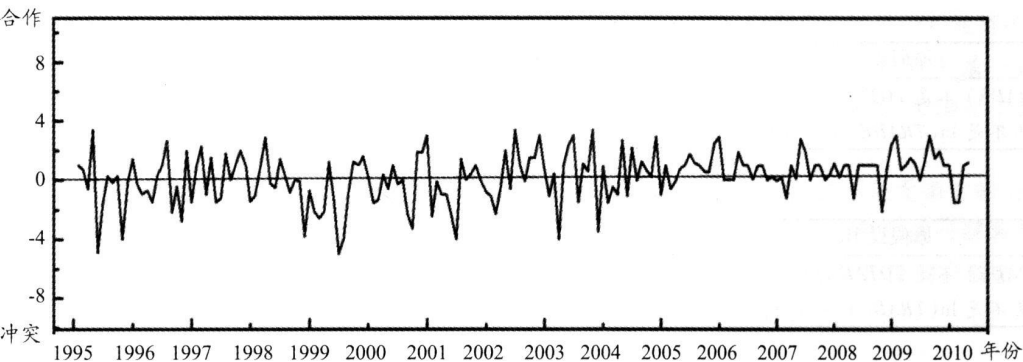
观念和不同需求所导致的矛盾成为中美关系中引发两国冲突最危险的导火线。

根据哈佛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开发 VRA (Virtual Research Associate) 数据的方法, 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中美大事记中提取事件, 对应 Goldstein (1992) 标准^①评出分数再整理, 按月加权并绘制出 1995 年 - 2010 年 4 月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中国对美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中美关系状况, 如图 2 图 3 图 4 所示。由图可以看出,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寻求的合作要多于美国对中国寻求的合作。说明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和平友好的关系, 中国的崛起也会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另外从图 4 可以看出, 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冲突, 说明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矛盾, 但整体发展态势还是利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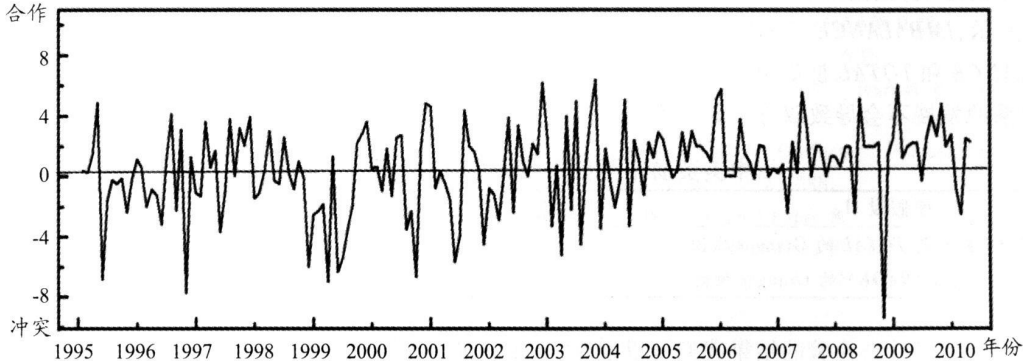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中美大事记对应 Goldstein (1992) 标准评分再整理绘制。

图 2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 (1995 - 2010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中美大事记对应 Goldstein (1992) 标准评分再整理绘制。

图 3 中国对美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 (1995 - 2010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中美大事记对应 Goldstein (1992) 标准评分再整理绘制。

图 4 中美双边合作与冲突 (1995 - 2010 年)

^①Goldstein 的事件对应值的表中, 负值表示冲突, - 10 表示最激烈的冲突, 正值表示合作, + 8 3 表示最高层次的合作, 零表示自然灾害和中性的社会活动。将每组国家按年算出所有事件的权重, 获得每年双边事件的整体冲突合作值。如果权重为正, 表示双边存在净合作, 如果权重为负, 表示双边存在净冲突。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 COW (Correlates of War) 中的冲突数据, 只包含了发起国与目标国之间每年新发生的冲突, 不足以代表国际关系这个综合性变量的性质。

(二)实证数据及结果

我们用 $TRADE$ 表示中美之间的出口和进口总额,用 $h(TRADE)$ 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增长率。相应年份的双边政治关系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中美大事记整理,正值表示合作,负值表示冲突,我们用 $TOTAL$ 代表两国合作与冲突的总值,即双边政治关系。实证检验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即检验中美贸易在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合作和冲突中的作用、中美贸易在中国对美国发起的合作和冲突的作用、中美贸易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

用 $EVIEWS6.0$ 软件来实现检验。对这几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它们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够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来构建模型,因此使用协整检验以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中美贸易与中美政治关系状态之间存在稳定均衡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借助 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因果关系检验中涉及到滞后阶的选取,本文根据 SC 、 AIC 最小准则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为 2。对各变量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如表 1、表 2、表 3 所示。表 1 反映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与美国对中国的冲突合作之间的关系,表 2 反映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与中国对美国的冲突合作之间的关系,表 3 反映的是中美双边贸易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

表 1 Granger 因果检验关系 (美国对中国)

原假设 H_0	滞后期数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h(TRADE)$ 不是 $TOTAL$ 的 Granger 原因	2	2.49310	0.0856	拒绝 H_0
$TOTAL$ 不是 $h(TRADE)$ 的 Granger 原因	2	0.63155	0.5330	不拒绝 H_0

表 2 Granger 因果检验关系 (中国对美国)

原假设 H_0	滞后期数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h(TRADE)$ 不是 $TOTAL$ 的 Granger 原因	2	8.81830	0.0002	拒绝 H_0
$TOTAL$ 不是 $h(TRADE)$ 的 Granger 原因	2	0.61339	0.5427	不拒绝 H_0

表 3 Granger 因果检验关系 (中美双边关系)

原假设 H_0	滞后期数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h(TRADE)$ 不是 $TOTAL$ 的 Granger 原因	2	6.07834	0.0028	拒绝 H_0
$TOTAL$ 不是 $h(TRADE)$ 的 Granger 原因	2	0.75934	0.4695	不拒绝 H_0

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造成了不少贸易摩擦和争端,该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关注的焦点,那么它对按 Goldstein 标准所衡量的政治关系是否会产生影响呢?为了证明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合作与冲突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用如上的方法进行检验, $MBALANCE$ 被用来表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数额。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MBALANCE$ 是 $TOTAL$ 的格兰杰原因,而 $TOTAL$ 不是 $MBALANCE$ 的格兰杰原因,回归方程表明 $MBALANCE$ 和 $TOTAL$ 是负相关的关系,这说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会对两国间的政治合作造成不利影响,但政治关系的发展不会导致双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表 4 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两国政治关系因果检验

原假设 H_0	滞后期数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h(TRADE)$ 不是 $TOTAL$ 的 Granger 原因	1	12.4521	0.0005	拒绝 H_0
$TOTAL$ 不是 $h(TRADE)$ 的 Granger 原因	1	0.13250	0.7163	不拒绝 H_0

从以上几个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还是中美总体来看,贸易都是增加双边合作、减少双边冲突的格兰杰原因。虽然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会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但中美贸易总体来说对两国政治冲突的消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我们还看到,两国政治合作并不是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这是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结果。这说明中美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并不一定那么强,在诱人的经济利益面前,中美贸易的发展对政治的依附性在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在美国,贸易活动的行为者更多是公司和个人而非国家,在制定购买决策时,国家较少干涉企业的经营行为,厂商主要只考虑成本和利润。

针对实证结果,我们分析中美贸易之所以能够超越不平衡问题成为促进双边合作、减少双边冲突的原

因。第一,贸易能稳定双边关系的发展。在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起伏不定的背景下,贸易和投资合作带来的利益能对双边关系起到稳定作用,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中国力量上升的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个要素——经济交往与战略防范,将长期共存并互相博弈,而随着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的加深,前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会逐步增大。第二,中美经济利益能超越其他非生死攸关方面的利益冲突。虽然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着不少纷争,但这恰恰说明中美都是经济理性的国家,都将经济利益摆在国家利益的核心地位。经济因素的意义不论大小都将全面体现于政治决策之中,而这正是经贸关系演绎出的政治内涵,也使得美国抑制“台独”有着强大的内驱力。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生死攸关的核心国家利益,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合作可以缓解其他方面的冲突。一种紧密的经贸关系可以缔造一种基于宽容、理解与顾忌基础上更为依赖的政治、外交与安全关系,中美之间这种贸易合作的迅猛发展大大压缩了美国发起冲突的政治冲动。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美贸易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更隐含着政治利益,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博弈。

以往的文献对贸易如何影响国际冲突观点不一,本文针对中美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模型分析中,我们推导出贸易的发展会减少国际冲突的发生。因为良好的贸易关系增大了发起冲突的成本,同时贸易的发展又可以替代发起冲突所获得的利益,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动机。在实证研究中,我们讨论了1995–2010年中美双边关系状况,并用两国的贸易月度数据和冲突合作数据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是影响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与政治关系长期保持平稳的正相关关系,即贸易具有显著的消减冲突、促进合作的效应。由此可见,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不仅仅限于对经济的影响,还会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产生深远作用。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说,“经贸关系一直是动荡不定的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因此,金融危机下中美应加强经贸合作以稳定双边关系,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属不明智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的双边关系中,贸易成为和平力量也不是无条件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的理论框架也有局限性,它只能针对已有的事实进行解释性分析而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测。只有当中美双方国家都认为贸易所衍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积极的且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来维持,贸易才能够成为抑制冲突升级、促进良好政治关系发展的有效动力。

参考文献:

1. 郎平, 2006《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
2. 柳剑平、刘威, 2009《美国对外经济制裁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3. 庄宗明、蔡洁, 2008a《国际贸易消减国际冲突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以亚洲国家为例》,《世界经济》第9期。
4. 庄宗明、蔡洁, 2008b《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吗?》,《国际经济评论》第5–6期。
5. Barbieri K.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 (1): 29–49.
6. Cai J., and L. An. 2010 “Can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duc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flict Management,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 272–288.
7. Donovan K. F. 1995 “Economic Power in the Sino-U. S. Relationship” *NSS Occasional Paper* 5.
8. Dorussen H. 2006 “Heterogeneous Trade Interests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0(1): 87–107.
9. Goldstein J. S. 1992 “A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 for WEIS Event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2): 369–385.
10. Hirschman A. O. 1980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Lee H. 200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Conflict” *University of Iowa Working Paper* 8.
12. Michael M. 1992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m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3. Mearsheimer J.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5–56.
14. Polachek S. 1980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1): 55–78.
15. Polachek S. 1992 “Conflict and Trade: An Economics Approach to Political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5(2): 89–120.
16. Polachek S., Robst J., and Y. C. Chang. 1999 “Liber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Extending the Trade-Conflict Mode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4): 405–422.
17. Reuveny R., and H. Kang. 2005 “A Simultaneous-Equations Model of Trad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2): 279–295.

(下转第142页)

- t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fforts of APEC Economies” Philippine APEC Study Center Network (PASCN) Discussion Paper
45. Quinn, D. P., and C. Inchausti. 1997. “The Origins of Financial Openness: A Study of Current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3): 771–813.
46. Quinn, D. P., C. Inchausti, and A. M. Toyoda. 2001. “How and Where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Leads to Economic Growth.” Georgetown Univers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47. Quinn, D. P. 2003.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1890–1999: A Synoptic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8(3): 189–204.
48. Quinn, D. P., and A. M. Toyoda. 2008. “Do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Lead to Growth?”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1(3): 1403.
49. Reisen, H., and H. Yeches. 1993. “Time-Varying Estimates on the Openness of the Capital Account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1(2): 285–305.
50. Rodrik, D. 1998. “Who Needs Capital-Account Convertibility?” I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207, ed. S. Fischer et al., 55–65.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51. Rossi, M. 1999.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 Do Capital Controls,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Matter?” MFW Working Paper, No. 99/66.
52. Sinn, S. 1992. “Saving-investment Correlations and Capital Mobility: On the Evidence from Annual Data.” *The Economic Journal*, 102(414): 1162–1170.
53. Tobin, J. 1983.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in the Long Run and the Short Run’ by M. Feldstein: Com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1(1–2): 153–156.

Measurement and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Financial Openness: Survey and Synthesis

Jia Qi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us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one country's financial openness, the design or selection of financial openness index is the basis for all other issues related with financial openness.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financial openness index could help to accurately measure a country's actual situation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is basis for subsequ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 jure and de facto of financial openness, a number of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dexes with greater influence from home and abroad are surveyed. Through discussing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bili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t starts and emphasis, as well as constraints of theory, methods or data, each financial openness index has its own unique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but overall, de jure and de facto indexes hav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veral main de jure index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de jure measurement improvement scheme.

Key Words Financial Openness; De Jure Measurement; De Facto Measurement

JEL Classification F21, F36, F41

(责任编辑: 彭爽)

(上接第 123 页)

18. Ripsman, N. M., and Blanchard, J. F. 1996. “A Guide to Conducting Case Studie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http://psweb.sbs.ohio-state.edu/faculty/bpollins/book/Ripsman_and_Blanchard.pdf
19. Schneider, G., and G. S. Günther. 2003. “Trade and Armed Conflict: The Domestic Foundations of Commercial Liberalism.”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Konstanz.
20. Snitwongse, K. 1998. “Thirty Years of ASEAN: Achievements through Political Cooperation.” *Pacific Review*, 11(2): 83–94.
21. Süheyla, Ö., and B. C. Nur. 2001. “Survival of Rationalism between Hos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8(4): 515–535.
22. Valentin, L. K. 2006.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Duration of Militarize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3): 243–260.
23. Waltz, K.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The Effect of Sino-US Trade Development on 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hip

Cai Jie and Chen Juny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the protectionism becomes fierce again. It damages the Sino-US trade relation. Furthermore, it also harms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has been proved its role in eliminat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by theoretical model. Meanwhile, the empirical study of 1995–2010 data shows that the Sino-US trade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of Sino-US political cooperation. Though there are some adverse influences induced by the bilateral trade imbalance, the trade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relation is steady-going positive. Therefore, instead of adopting trade protectionism policy, China and USA should enh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stabiliz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Sino-US Trade; Economical Relationship; Political Relationship

JEL Classification F15, F36, G31

(责任编辑: 陈永清)